

国家教委“八五”规划国际专题

21世纪

中美经贸关系展望

赵传君 ● 著

77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引 言

在我们满怀希望走向 21 世纪的时候,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无论是中国的和平统一、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和实现 21 世纪的战略目标,还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等,都与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密切相关。现在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想知道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前景,全世界都想知道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前景,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课题。然而,中美经贸关系不但受经济因素影响,而且还强烈地受战略因素和政治因素影响,不但受中美双方因素影响,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与世界因素影响。它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敏感的关系体系。因此,考察和预测中美经贸关系必须将其放在中美整体关系的大范围内和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结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的未来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问号,有人对它悲观失望,有人认为无可奉告。笔者在对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即认为中美关系已从战略主导型、政治主导型开始走向经贸主导型,21 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乐观的看法绝不是一种凭空推导和良好愿望,而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各种趋向进行深入探索和综合判断的结果。我对这一结论充满信心,对 21 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充满信心。因此我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而我们将来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为争取这一乐观的前途而作出最大努力。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美战略关系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1)

- 一、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1)
- 二、中国威胁: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 (10)
- 三、遏制战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6)
- 四、利害选择: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 (21)
- 五、美国——中国:战略关系尚未定位 (28)

第二章 台湾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47)

- 一、美国对台政策面临考验 (47)
- 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与承诺是危险的 (57)
- 三、对台湾的统一立场及其真实意图剖析 (61)
- 四、美国的对台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70)

第三章 香港回归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73)

- 一、香港回归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地位
将显著提高 (73)
- 二、香港回归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76)
- 三、对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因素分析 (84)

第四章 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 (90)
- 一、中日经济、政治及战略关系分析 (90)
- 二、日美经济、政治及战略关系分析 (104)
- 三、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116)

第五章 中欧关系和美欧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	(120)
一、中欧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	(120)
二、中欧政治与战略关系分析	(133)
三、欧盟与美国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	(137)
四、中欧关系、欧美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150)
第六章 中俄关系、美俄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	(154)
一、中俄经济、政治及战略关系分析.....	(154)
二、俄美经济、政治及战略关系分析.....	(164)
三、中俄关系、俄美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168)
第七章 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发展与政治关系变化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173)
一、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前景	(173)
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185)
三、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	(188)
四、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198)
五、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03)
第八章 21 世纪美国经济的难题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09)
一、衰落感、危机感与经济第一主义.....	(209)
二、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的困扰	(215)
三、债务、赤字和逆差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218)
四、国际竞争力下降令美国人担忧	(222)
五、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226)
六、美元危机预示着美国经济前景的一种不祥之兆	(232)
七、社会福利滋生的毒瘤日见膨胀	(236)

八、失业压力将日渐增大	(239)
九、美国将面临的经济难题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41)
第九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44)
一、“一国两制”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44)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48)
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50)
四、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53)
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56)
六、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中美经贸 关系的影响	(259)
七、中国服务市场的发展与开放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64)
八、中国的市场体系与市场环境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70)
九、中国的“九五”计划与 2010 年远景目标对中美经贸 关系的影响	(272)
十、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与政策对将中美经贸关系产生 的影响	(276)
十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对中美 经贸关系的影响	(277)
第十章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四大矛盾及其演化趋势	(285)
一、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问题	(285)
二、关于市场准入问题	(293)
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307)
四、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	(321)

第十一章 21 世纪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及中国的战略

选择	(331)
一、历史的启迪	(331)
二、对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 的综合分析	(337)
三、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354)
四、开展立体化宣传攻势,建立多层次沟通管道,让美国 真正了解中国	(379)
后 记	(391)

中美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美政治关系，而中美政治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因此，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与走向是中美政治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第一章 中美战略关系的过去、 现状与未来

一、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二战之后，美国就拟定了把亚太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战略计划。而要在亚太地区进行扩张必须以东亚地区为立足点，要在东亚立足，中国自然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所以，“一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会是整个亚洲的关键。”（迈克尔·谢勒著《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中译本第96页）因此，在二战后美国积极扶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企图使中国成为其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战略基地。然而，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美国的亚太战略遭到严重挫折。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中国不是作为美国的盟国而是作为前苏联的盟国而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使中国仍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社会主义制度向世界“扩张”和共产主义思

想向世界“扩散”，在亚太地区中国则是遏制的重点。因此，美国积极支持、扶植和控制东亚地区的日本政权、台湾国民党政权、南韩的李承晚政权、菲律宾政权和南越的阮文绍政权，与这些政权结成了一个地域广泛的军事联盟，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和后盾的共同防卫体系，构筑起一个对中国进行包围、封锁和遏制的战略链条。

60年代，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日益表面化，中苏联盟的局面开始走向尾声。这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的全面扩张，而在亚太地区则是采取与苏联和中国同时对抗的政策。到60年代末期，中苏间的意识形态论战发展到局部武装冲突和军事对抗，而苏联则利用美国陷于越战泥潭的机会，对美国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开始对其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进行历史性的重大调整，即开始实行“联华抗苏”的战略。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双边关系的性质与发展前途的角度看，中国当时也视苏联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苏联是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中国也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形成对苏联的战略牵制，从而减小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由于中美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都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对立和地区性的局部利益，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出现了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大三角。在这种战略大三角中，无论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是亚太战略，中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从此，美国经常打“中国牌”对苏联实行有效的战略牵制，中国也以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为基础与苏联进行抗衡并遏制其在亚太地区的肆意扩张。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美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开始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关系方向发展，从而强化了这种战略合作的基础。然而在80年代后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新思维”方式推动苏美关系走向对话与缓和，从而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下降。美国在这一时期仍把中国作为对苏的一种牵制力量，但又防止过分打“中国牌”刺激苏联，使美苏关系倒退。同时也密切注视中苏关系的发展，担心中苏重新结盟来抗衡美国。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基

本上放弃了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强硬的制裁与高压政策,企图促使中国向所谓“民主政治”转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格局中的大三角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向西方靠拢并很快展开了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私有化进程。1992年俄美签署了《华盛顿宪章》,以后俄国又与西方探讨与北约组织建立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至此,苏美对抗的两极战略格局已经消失,中国已不具有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美国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重要性的认识与判断,取决于美国对未来国际关系主要发展趋势的判断,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未来对外政策方向的判断。从1991年起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两届政府,即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未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的和最后的判断,所以这两届政府基本上都是奉行“对话与制裁”相结合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处于一种起伏不定,艰难发展的局面。

目前,关于美国应奉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如何确定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在美国国内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令人担心,到下个世纪中国可能会发展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从而对美国的安全、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因而主张把中国视为战略上的潜在敌人,采取遏制战略和强硬政策,力图在中国发展成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之前消除这一隐患。1996年2月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亚洲安全问题研讨会上,美国防大学国际事务问题教授保罗·戈得温提醒人们,“中国坚决与美国对抗是不祥之兆”。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普日斯图普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他说,“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还没有定论”。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和遏制战略的观点在美国国会得到了相当的认同,因此在冷战后的近5年来的中美关系中,国会总是极力推动甚至迫使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方针和制裁措施。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国会多

次阻挠延长对华的最惠国待遇，坚持贸易与人权挂钩的方针。美国国会多次审查和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极力主张以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情况来确定对华政策并以人权为借口要求中国改革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在1996年2月份我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于21日以91票对1票通过了一项要求政府进行军事干预“保卫”台湾的决议，决议还要求向台湾提供海军舰艇、飞机和空防设备在内的“防御性”武器。在此前，众议院也通过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在7月20日，众议院以416票对10票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密切监视中国的行为，要求总统每6个月报告在人权、武器销售和其它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外交建议。它还授权“自由亚洲电台”在该法案最终通过后3个月内开始对中国广播。

从上述可以看出美国国会一直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戒心和明显的敌意，而“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也一直趋向于把叶利钦的俄罗斯当作美国的朋友，而强调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必定会带来潜在的军事威胁。因此难怪很多美国人现在开始把预测中国成为一支全球力量与出现一个全球威胁等同起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995年10月29日在《华盛顿时报》撰文：“中国是全球力量还是全球问题”）。

这种遏制观点虽然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意识、情绪甚至也可说是一种思潮，但还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也没有展开系统和深层的理论分析，还只限于感性与经验的一种预测，有时更象是对中国目前对外政策的一种未来推断。这种遏制观点没有形成系统的战略思想，没有获得美国各界的共识，目前还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应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寻找与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与中国建立起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以维持亚洲的稳定与世界和平。

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仍不能离开中美三个公报的轨道，因为这三个公报的基本原则是六届美国总

统都认同的原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留给美国人民“最后的政治遗嘱”中说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和经济强国。在东南亚、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冲突中，它完全有力量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由合作变为敌对，中国有能力在全世界干扰我们的利益。”“不管批评中国人的动机如何，他们是在破坏我们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的核国家之一以及潜在的 21 世纪最富强的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他们也破坏中国人民生活在自由与繁荣之中的良好前景。”“在冷战期间，促使美国与中国相互靠拢并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惧。在超越和平以后的时期，我们需要用新的经济动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理查德·M·尼克松著《超越和平》1995 年 4 月版中译本第 102 页、106 页、109 页）。

美国前国务卿、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于 1996 年 3 月 31 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如果同中国敌对将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久的方面，那样我们就找不到盟友了。正如美国的声望曾经随着对中国开放而日益提高一样，到那时大多数亚洲国家将会指责美国挑起了一场人们所不希望的同北京的冷战。”“尽管中国同美国之间目前存在着紧张关系，在我看来，使亚洲实现和平的演进仍旧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之所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亚洲稳定以及世界和平的关键。”“这一政策（指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包括现任总统在内的六位美国总统所倡导的，而且写进了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位总统批准的三个联合公报之中。”“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为李登辉发放签证一事。此前一个月，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还向中国外长保证决不会发放签证，因为这是违反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的。”“至于美国的政策，政府应当重新信守其实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默契，免得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采取威胁行动，这就需要：（1）不要把对外政策作为一种取悦国内一些互不相容的选区的手段；（2）寻找并公开承认同北京之间的某种共同利益；（3）进行认真的对话来使这种共同利益具有生命力。”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接受《华盛顿时报》记者威利斯·威特

采访时，当威特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或军事强国崛起是否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布什说，“我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减轻这种担心的最佳方法是美国仍同中国保持接触，同中国一起努力并在可能的地方同中国合作来实现变革，但要少对立多磋商。”“我们同中国密切合作而不是让人看来好象我们时时都在教训他们。我们还应当同中国有持续不断和范围广泛的战略对话，这种对话涉及全世界。”当威特问，鉴于目前美中关系状况，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下一次首脑会议上通过第四个美中联合公报是否有时，布什说“我要让通过第四个公报的问题由政府来回答。我确实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使国会的新老议员在现有的公报基础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必须同中国密切合作，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去中国访问。”“我深信，我们的长期分歧必须和平解决，也将会和平解决。”（美国《华盛顿时报》1995年9月20日文章《对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采访记》）

美国前国家安一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如何确定中国在上世界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仍然是将来的中心问题。”“美国应当提议，随着香港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归中国，中国主席应被邀请参加每年一度的七国首脑会议。这一会议原本应是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首脑的年会，但它已经吸收了俄国，而俄国很难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更不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因此，把中国排除在外无论从经济上说还是从地缘政治上说都是讲不通的。在吸收新成员方面采取一种耐心的、长远的战略更有可能鼓励中国成为一个采取合作态度的全球强国。”（美国《华盛顿时报》1995年10月29日文章《中国是全球力量还是全球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于1996年4月1日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说：“我们与中国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我们的共同利益应当决定我们对北京采取合作方针。”“中国自身的利益与美国的愿望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和韩国同中国的利害关系与美国的目标大体上是吻合的。”“欢迎中国参加确

定未来的世界论坛，如世界贸易组织、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乃至七国集团。”

美国很有影响的《商业周刊》于1996年3月4日发表题为“请不要同中国打冷战”的社论。社论说，“美国对华政策在自觉不自觉地由保持交往滑向遏制。现在是根据实用政治和各自的国家利益来制定一项战略的时候了。”“美国要是把一个现在还不是敌人的国家变成一个敌人，那将是愚蠢的行为。”“现在需要采取大胆行动。目前正毒化着两国关系的矛盾和猜疑应当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中国签署一个新的上海公报的办法来消除。这第二个上海公报应当在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1972年签署的第一个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1972年的公报为20年来的和平关系和经济的互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种观点是，既不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也不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即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很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但又对中国的很多内外政策持敌视和批评态度，并担心中国对美国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主张对话与制裁并用，接触与威胁并用的政策，其宗旨就是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策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在中国成为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之前，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体系”，消除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威胁。上述观点是美国现政府中主要决策者们的基本观点，因此它构成了美国目前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并强烈反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

克林顿总统认为，美中关系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美中要保持经常性接触、“建设性接触”和“战略对话”，以磋商和对话解决美中之间的一些敏感性问题和重大分歧。在1995年10月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克林顿总统曾向江泽民主席申明他的“三不政策”，即不遏制、不孤立和不封锁。然而，在近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却以制裁、威胁、批评、指责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施压，甚至采取严重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本原则的行动，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使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甚至接近于对抗的边缘。如美国政府多次发出贸易制裁的威胁,激烈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提高台湾政府与美国的交往级别,为李登辉访美签证,以及在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期间派航母作战群来台湾海峡炫耀武力等,都带有明显的对抗与遏制色彩,几乎接近于极端政策的边缘。

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这种主导思想和政策特点也是克林顿政府主要阁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 1996 年 2 月 13 日在“美国、日本与中国关系”研讨会上说:“我们在亚太地区的防御性战略的第三支柱就是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因为中国在地地区安全,诚然还有在世界安全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选择接触并不是偏爱中国。我们选择接触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是为我们的安全利益服务的。与中国接触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渠道。”据合众国际社 1996 年 2 月 21 日电讯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他尚未确认中国是否违反 1994 年防止核扩散条约——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将受到制裁。据同一报道,克林顿主张在制裁问题上“采取强有力”的方针。据法新社日内瓦 1996 年 3 月 20 日电讯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奥尔布赖特于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并不谋求同中国对抗。”“美国航空母舰到该地区‘是为了避免对抗升级’,我们说得非常清楚,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据合众国际社华盛顿 1996 年 2 月 21 日电讯报道,美国官员当天说,美国总统克林顿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通过举行高级会晤改善关系,同时压北京采取强硬方针的政权停止转移敏感的武器技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坎佩尔在 1995 年 6 月 2 日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今天正是保持接触,对中国到底以什么样的国家登上政治舞台施加影响的时候。在美国国会有人主张遏制中国,但是当前同中国保持联系对我们有利。如果中国拒绝合作,那么还有同盟国合作阻止中国成为危险的大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敌视中国,那就不容易同中国保持联系。”同年 7 月 21 日坎佩尔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今后的 10 年将决定中国的性质。”在这里坎佩尔

暗示,在今后的 10 年当中要努力使中国成为美国所需要和所希望的国家,把中国引导到美国所设计的国际轨道上来。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就要采取遏制战略,同中国打“冷战”。美国《外交》杂志常务主编扎卡里 1996 年 2 月 18 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如果北京抱着固有的敌视态度,我们可以付出巨大代价对付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并努力改变它,正象我们过去对希特勒的德国和苏联所作的那样。但是中国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华盛顿不得不对它容忍一会。随着中国将来变得更加清楚,美国的政策也会变得更加清楚。”

上述三种观点根据所持观点的群体性质,也可说是国会观点、政府观点和“退休”的政治家观点这样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需要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与其进行合作,美国希望中国转变成美国所希望和所需要的国家;都承认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都承认中美对抗和采取遏制战略美国将付出重大代价。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却极端不满,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关系恶化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和所谓的不负责行为,基本上是以敌视的态度看待和对待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按国会的观点倾向于对中国进行制裁与对抗,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政府的观点与国会的观点有所不同,它既不把中国看作敌人,也不把中国当作朋友,甚至也不当作伙伴,而是看作可能成为敌人也可能成为伙伴的“未定性的国家”。所以可暂不采取对抗和遏制政策,要观察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采取接触与施压、对话与威胁并用的方式,促使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如果中国“顽固不化”,走向所谓极端政策,那就是美国的敌人,就要采取遏制政策。如果中国向美国引导的方向转变,就可能变成美国的合作伙伴。

“退休”的政治家们的观点与上述两种观点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敌人,除非美国想把它变成敌人。他们认为应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坚持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尽量找出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加强和

推进双方的合作。同时通过经常性的对话与磋商,加深对对方情况和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努力找出解决主要分歧的途径与方法。他们反对对抗与遏制政策,主张对话与合作。

二、中国威胁: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会一些人不断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和强硬态度,极力主张对华实行遏制政策,其中一条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他们“发现”了中国的战略威胁。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威胁论”感到莫名其妙,大惑不解,不知中国在哪方面构成了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甚至连中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在一夜之间竟变得如此强大和如此可怕,以至于竟使象美国这样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都感到了威胁与恐惧。那么实际上存不存在中国对美国的所谓威胁呢?让我们不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和立场,也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和立场,而是站在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的角度上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作一点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从军事上看,中国虽然是核大国,但目前还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核对抗,更谈不上对美国构成核威胁。可以预计,10年之后中国也不会对美国构成核威胁,现在世界上唯一能对美国构成核威胁的只有俄罗斯。况且,中国早就向世界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见中国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用了防御,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防止核讹诈。中国进行有限的核试验是非常谨慎和有控制的,中国宣布一旦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它将立即停止核试验。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中国是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他不愿看到一些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失去理智、进行独裁与暴政统治的和处于战争与动乱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以此来威胁国际社会,它也不同意某些核大国一方面禁止别人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自己却继续发展核武器的作法,它主张全

面禁核试验,彻底销毁核武器,使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摆脱核威胁,避免核灾难。这种明确的、彻底的核立场如果说在冷战时期还难以让苏美两大对立集团接受的话,那么在冷战后的今天肯定会受到全世界普遍的欢迎。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和地区结成军事联盟和军事集团,除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外,没有向任何国家和地区派遣一兵一卒的海外驻军,没有在海外建立任何军事基地,没有对自己主权范围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承担军事防卫或军事保护义务,而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北约军事集团并且仍在扩充成员,在海外有很多军事基地,在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有自己 20 余万的驻军,相比之下,中国在战略态势上根本就无法与美国匹敌。

美国在北约的常规武装力量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规模、素质、装备、侦察、通讯、指挥、后勤等方面,还是在作战能力、机动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陆海空联合作战能力方面,中国军队都是望尘莫及的。中国军队要打现代化战争至少还需 20 年时间。中国的海军力量、空军力量与美国相差悬殊,如果设想中国军队越过大西洋去攻击美国,世界上有谁会相信这种可能性呢?中国加速军队现代化是为了使其具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与美国没有任何领土、领空和领海争端,中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和地区提出过领土要求,并一贯采取积极与合作的方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议,它从不想用军队去扩张自己的版图和势力范围,也不想以武力为后盾去谋取地区霸权和世界霸权。1997 年和 1999 年它将以和平的、建设性的方式分别收回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事实。所以,中国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无可非议。中国之所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主要是针对搞“台独”和“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和外国势力干预中国统一的企图,这一立场体现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原则,应该得到世界的理解。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中国也愿意与有关国家通过对